

# 广播电台与新时期听觉经验的生成

## ——从刘心武小说的播出说起

杨毅

**内容提要** 1978—1980年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刘心武同时期创作的多部小说。通过广播电台的播出，刘心武小说以声音的形式迅速传播，极大提升了作家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奠定了其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地位。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的播出不仅以爱情题材开启个人情感的回归，也在声音的层面上激活了现代主体的听觉经验。从媒介技术的角度说，文学借助广播实现“再媒介化”，符合新时期的时代要求，在生成“听觉共同体”的同时，也通过听众自主化的解读使小说超出自身的时代主题，体现出新时期听觉文化的复杂经验。

**关键词** 广播电台；听觉经验；刘心武；声音研究

1978年至1980年前后，刘心武连续发表了《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等小说，引起较大反响。但还要补充的是，广播电台的播出加速了小说在社会上的传播，极大提升了作家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奠定其在新时期文学初期的地位。通过广播电台，特别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出，刘心武的小说以声音化的形式迅速传播，成为声音文本的独特叙事方式，与纸质文学彼此呼应。在传播方式和效果上，广播不仅源于国家文化体制的推行，也随着收音机的普及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耐用品。广播作为“近代化的强有力的宣传工具”<sup>[1]</sup>，以强大的传播优势提升文学的影响，从而形成普及化的接受方式和大众化的认知模式，伴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暗中转换了以往旧的声音形态，建构了国人在新时期初期的听觉经验。听觉文化研究表明，听觉不仅塑造和影响了人类获得经验的内容和方式，其自身也是文化建构的结果。声音文本的生成、聆听方式的选择和听觉主体的再造，都离不开塑造听觉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听觉方式及其所听之物，关系到时代审美文化的变迁。不妨

说，广播电台的播出，既在文学的层面上奠定刘心武小说的地位，也在声音的意义上生成新的听觉经验，两者在彼此互动中建构了新时期的听觉文化。

### 一 作为听觉文化的刘心武小说

1978年前后，随着《班主任》等小说的发表，刘心武以描写历史创伤和反映社会现实为主题的小说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在小说的传播过程中，广播电台尤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作用不可小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刘心武的小说改编成广播剧、广播小说，或者通过直接朗诵的形式播出，提升了作家在社会范围内的影响，成为发生在公共领域的听觉事件。

事实上，刘心武小说真正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正是与广播这种大众媒介有关。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媒介，广播无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接受讯息的最主要来源。“在中国，广播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普及。在当时，广播的主打内容和听众最常收听的是戏曲、广播剧和小说连续广播节目。”<sup>[2]</sup>1978年至1980年，刘心武的《班主任》

《醒来吧，弟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被改编成广播剧播出，《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爱情的位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小说连续广播》节目，以直接朗诵或广播小说的形式播出，使刘心武的作品传入千家万户而广为人知，直接奠定了刘心武在新时期文坛的地位。刘心武对此有清晰的认知：“杂志负责人和编辑对这些作品的出世当然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作品的推广，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电台的广播。”他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些人的成名归功于时代的思想潮流，“加以有这样的广播托举而名噪一时，纷纷涌进文坛，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sup>[3]</sup>，甚至干脆说自己的成名，“既是通过文字，更是乘着电波的翅膀达到极致的”<sup>[4]</sup>。有人曾回忆自己当年知道刘心武的名字，正是因为听了收音机里播放的由《班主任》改编的同名广播剧，甚至很多人并不是直接读到文字，而是从广播里听到的。“《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sup>[5]</sup>显然，人们收听广播远比获得刚出版的期刊杂志拥有更多的便利条件。收听播出的文艺节目也比直接阅读文学作品具有更低层次的专业要求。因此，和小说最先发表在期刊杂志的纸质媒介相比，广播电台具有更加强大的传播优势，能够在播出的同时迅速覆盖到无法估量的听众。

不妨说，广播电台既是小说广泛传播的媒介基础，也是普通民众接受文学的重要方式，“使当时还不能直接及时看到报刊的人们，特别是还在农村插队或在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年轻人，从电波里一下子听到了跟‘四人帮’那时候完全不同的声音，以至于印象深刻到终身难忘的程度。”<sup>[6]</sup>普通听众的回忆或许能为我们还原当年收听小说时那种激动人心的情景：“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夜。军工厂那道森严的铁丝网下，我和几个军工战士围坐在一堆篝火边，静静地聆听着半导体里播放同名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班主任》。那充满磁性的男中音，激荡心魂的故事情节，与篝火一道熊熊燃烧。那时起，我知道了作家刘心武的名字。”<sup>[7]</sup>森严的铁丝网下围坐篝火旁收听小说的场景颇具隐喻意味：收音机里传出的广播剧的声音，既成为刚刚告别禁锢年代的

难能可贵的声音景观，也暗示出这种声音景观在历史转折期的形态。

这种声音形态源于广播特有的传播机制在转折期发挥的作用。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揭开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序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1978年11月6日起，在《学习》节目中连续播出《理论和实践问题广播讲座》。随后，全国宣传系统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胡耀邦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现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方面来了，新闻工作就应该以立为主，立中间还要继续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克服各种消极因素”，“要经常宣传报道丰富多采[彩]、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比如科学报告会、政治时事座谈会、音乐会、诗歌朗诵会”<sup>[8]</sup>。1980年10月召开的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广播文艺、电视文艺的巨大作用，积极发展广播剧、广播小说和电视剧、电视小品”，“应该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播送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种形式，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优秀作品，但要适当地多播些我国的和现代题材的作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欣赏和娱乐的要求”<sup>[9]</sup>。在此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恢复和增加了《外国作品音乐会》《星期音乐会》《音乐厅》《听众点播的音乐节目》《听众点播的戏曲节目》《京剧选段》《电影、话剧》《小说连续广播》《曲艺》等文艺节目”<sup>[10]</sup>。王蒙感慨道：“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当收音机里传出诗歌演唱朗诵会上王昆、郭兰英、王玉珍的歌声的时候，多少人的眼泪湿透了襟衫。后来，我们又听到了列宁喜爱的歌，听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听到了《刘三姐》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最近，我们又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舒曼作曲的《梦幻曲》。”<sup>[11]</sup>

就文学节目而言，听众接受程度最高的《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自1958年5月开办以来，播出的作品有《红旗谱》《红岩》《红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1964年5月更名为《小说连续广播》，播出的作品有《三里湾》《艳阳天》《百炼成钢》等；1965年响应走民族化道路更名为《说新书》，播出了《欧阳海之歌》《焦裕禄》等新评书；1974年恢

复播出<sup>[12]</sup>。由此看来,广播电台通过对当时流行的文学作品进行播出,主要目的是对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作品进行推广普及,在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更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意识形态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广播节目的声音较为单调,政治主题而非艺术审美充当广播媒介的主要功能,并成为听众习焉不察的审美机制。因此,正当以刘心武小说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在1978年前后占据文坛潮流之时,广播电台的播出,既贯彻了国家顶层的方针政策,也敏锐捕捉到文学思潮的变化,及时呼应新时期文学创作,将文学作品及其携带的时代信息,以声音的方式传达给广大听众,由此引发强烈反响。

小说播出后不久,在《人民文学》举办的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中,根据群众投票的初选结果,得票300张以上的作品共12篇全部入选,其中刘心武的小说独占2篇。编辑部在给评委的信中说:“在初选篇目中,刘心武同志的作品占了两篇(《班主任》和《爱情的位置》),是否合适?我们认为从作品质量、社会影响以及群众投票的情况来看,这样做比较合适。”<sup>[13]</sup>由于“这个初选篇目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群众‘投票’最多和较多的”<sup>[14]</sup>,这就无法否认广播电台对小说传播带来的作用,也呼应了刘心武将广播电台的播出称为“一张无形的巨大选票”<sup>[15]</sup>的说法,而最终的结果也是《班主任》位列榜首。尽管作品获得成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从小说在社会上的推广普及到无形中影响评奖,广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正如黄平指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78年将《班主任》制作成广播剧播出,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班主任》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奠定了其在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的地位。”<sup>[16]</sup>

## 二 《爱情的位置》:广播电台的声音叙事与听觉经验

或许是由于《班主任》播出收到的良好效果,从1978年7月20日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用连续四天的时间播送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此次播出后,很多听众来信

表示欢迎。但因为当时正值全国高考的时间,很多青年来信反映无法听全,要求延期播出,但由于节目已经安排好而无法延期,电台为满足广大青年听众的要求,从8月9日开始,又用连续四天的时间重播这篇小说。从播出的次数和实际效果上看,《爱情的位置》受到的欢迎程度不仅超出了此前的作品,甚至“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sup>[17]</sup>,以至于“还没有发表,就收到一千多封信”<sup>[18]</sup>。这里所说的“还没有发表”,是指重播时的小说原作刚刚发表在《十月》创刊号上<sup>[19]</sup>,但考虑到杂志发行的时间,人们在收听小说时应当是没有看到文字的,再加上广播电台首次播出的时间原本就早于杂志出版的时间。也就是说,与《班主任》发表后被改编成广播剧不同,《爱情的位置》在发表前就已经在广播电台播出而引起轰动<sup>[20]</sup>。而随后的发表再次加速了小说的传播:“经过许多报刊转载和电台广播以后,短短一个月里我就收到了超过7000封的读者来信!”<sup>[21]</sup>

《爱情的位置》的播出受到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在青年中引起的强烈反响,是电台和作家本人都始料未及的。9月23日至24日,《青年节目》又集中播出了关于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的来信及作者刘心武的复信。紧接着,极少播出短篇小说的《小说连续广播》也用连续四天的时间播讲《爱情的位置》。广播电台基于以上受欢迎程度,又将其改编为广播小说播出。此外,电台的《青年节目》编辑组又从几千封听众来信中选出不同特点的来信25封,随刘心武的复信和小说编成《让我们来讨论爱情》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出版。至此不难看出,《爱情的位置》首先是因为广播电台的播出而先声夺人,紧接着就始料未及地掀起了全社会的热潮。事实上,无论是小说本身的情节内容还是观众收听后的来信讨论,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正是爱情题材的回归。在刚刚过去的年代里,“爱情”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洪水猛兽,不仅成为创作领域的“禁区”,而且造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此的种种误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心武“决定构思一篇作品,主题先行,题目一定要定为《爱情的位置》,为爱情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面恢复名誉,获得应有的位置”<sup>[22]</sup>。

实际上,当时的评论家也大多从“冲破禁区”“爱情归来”“人性复苏”的角度评价这篇小说。比如何西来说:“爱是人的权利,描写爱情,是文学的天职。《爱情的位置》的贡献就在于它第一个冲破了爱情描写的禁区,捍卫了这个权利和这个天职。”<sup>[23]</sup>雷达进一步指出:“小说不但揭开了蕴蓄着人们深厚感情的内心的帷幕,触及到千万青年至为关切的恋爱婚姻问题,而且……热情地肯定和赞扬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高尚、健康、美好的爱情。”<sup>[24]</sup>这些看法本身就内在于文学领域对爱情题材回归的渴望与共识<sup>[25]</sup>。正如冯牧在讲话中指出:“在一个时期之内,描写爱情也成了禁区了,说起来这是荒唐的事。当然我们不能把爱情描写得很低级很庸俗,但是健康的正当的爱情是我们社会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怎么可能把这部分生活内容排除在我们文艺创作之外呢?”<sup>[26]</sup>重新肯定爱情与人性的合法性,正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艺界冲破禁区、“拨乱反正”的普遍潮流。广播电台长期作为国家主导的文化体制的宣传机构,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不容置疑的作用。因此,正当文艺界还在小心试探着能否冲破禁区的边缘时,广播以“先声夺人”的姿态和勇气,从内容和形式上挑战了过去不曾出现的题材和声音形态。这种冲击带给人们的感受是空前的,由此生成不同以往的听觉经验。

这种不同以往的听觉经验,不仅源于小说本身的爱情题材和人性话语的回归,还涉及到小说通过广播播出而形成的声音文本。换言之,与上述题材上的突破,即“播什么”相比,“怎么播”则是广播这种声音媒介特有的表达方式。广播媒介不同于印刷媒介的主要之处,正是基于电子媒介技术所特有的声音叙事。如果说,《班主任》的播出还是当小说发表而引起反响之后的推波助澜,那么《爱情的位置》则完全是依靠广播引发的热烈讨论——这就不仅在传播的意义上推动了小说的推广普及,更通过广播特有的声音叙事生成新的听觉经验。

这种听觉经验首先源于小说有声化形成的声音文本所传达的形态意义。与承载文字的印刷媒介不同,小说经过朗诵的方式将原有的文字转变为声音文本,在媒介转换中获取了新的表达方式和审美

感受。尽管现代录音技术使得声音可以脱离声源而独立存在,但是声音所特有的“现场感”总是造成发音者肉身在场的幻觉,“只是活生生的现在在中面对现在自我在场的可能性”<sup>[27]</sup>,仿佛神圣的布道者将声音语气留在这里与你同在,甚至收听小说可能比阅读获得更加直接而深刻的感受。在《青年节目》播出的短篇小说《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董行佶的朗诵带给小说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刘心武说:“节目播出了,我听得发愣——这是我写的那些浅陋的文字吗?一句一字没改,听来却成了另外一个温馨而清新的故事。我这才深切地懂得,什么叫做朗诵艺术。董行佶把我作品里那些累赘粗糙的文句轻轻掠过,把作品里能够打动听众的元素似乎是不经意地拎起,仅仅用他那绝妙的声音处理,就使这篇小说仿佛脱胎换骨,从一个粗陶碗变成一件细瓷器。”刘心武认为小说播出后获得肯定的原因,既是因为题材本身抓住了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也因为“获得董行佶这样的朗诵艺术家的再创造,他的声音,比我那些文字,更能激荡青年人的情怀”<sup>[28]</sup>。

刘心武充分肯定艺术家的造诣并没有错,但还要补充的是,由于播讲小说并不是对原作的直接复制,而是带有播讲者对自身声音技术的处理。因此,通过对播讲者朗诵艺术的描述,可以看出播讲小说所运用的声音技术,连同录制中运用配乐等手法,都与当时思想解放的社会文化思潮密不可分。这就要回到1978年前后人们在收听广播时产生的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听觉感受。在此以前,作为国家基层传播的主要媒介手段,高音喇叭不仅遍布大街小巷,还安装到每家每户,“那时时兴把高音喇叭的音量调至最大,传出的声浪在广袤的田野上滚动弥散,遇到丘陵山谷还会发出轰隆的回音,透过听觉给人心灵的震撼是无可遁逃的。因此,1978年仲春,突然有一天他们从那高音喇叭里听到了谷文娟等编录的节目,内容上对‘文革’发出了质疑,宣布了爱情在人生中有合理位置,配乐里出现了贝多芬的《命运》旋律,又有轻柔的絮语与抒情的琴音,这让在田野中的他们惊奇、惊喜,‘世道要变了’,他们也因之释放出了求变履新的青春情怀。在这样的田野聆听里,他

们感受到被启蒙的喜悦与激动，于是他们记住了那些作品与作者的名字。许多这样的青年是先听到广播，再去找报刊书籍阅读相应文字的。”<sup>[29]</sup>还有位插队知青，“说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见村旁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传出‘现在播送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的声音……后来他知道那是良性的政治变化的‘前兆’”<sup>[30]</sup>。

这些生动的回忆再现了思想解放初期的人们的听觉感官经受的强烈震撼。这表明声音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审美上的体验，更是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颠覆。阿达利认为，“音乐是真实世界可信的暗喻，它既不是自给自足的活动，也不是经济基础架构的机械式指标。它是先驱者，因为社会在改变之前，变动已先铭刻于噪音之中”。他将音乐比作镜子，以此来“反射、界定、记录和扭曲每一个活动”：“我们注视其中一面镜子，看到的却是另一面的影像。然而有时候，繁复的镜子游戏，由于它不可预期而且具有先知性，会产生丰富的灵视。”<sup>[31]</sup>阿达利的观点对我们研究广播的启示在于，广播电台作为国家强有力的宣传工具，借助录音和无线电传输技术来规定声音的政治含义。广播诉诸编码后的声音文本，激活听众对声音秩序接受，促使声音成为建构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先声阵地。新时期初期的广播电台重新唤起了人们的感官经验，而这种感官经验并不必然地内在于人的听觉系统，而是在各种声音景观的较量之中生成的，“应该既是一个物理环境，同时又是感知该环境的方式及其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建构”<sup>[32]</sup>。事实上，声音叙事及其听觉经验的生成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建构起来的。如果没有此前对人们日常生活和世俗情感的压制，就不会有这时候对健康积极的内心情感的渴望。如果不是禁锢已久的身体感官，就不会因为广播中的动听旋律而激动万分。应该说，广播通过声音叙事的方式直接作用于听众的感官，以此加强了小说所要传达的主题。不难想象，对于听惯了那种刺耳轰鸣且不容置疑的高音喇叭的人们来说，广播里突然传出的悦耳动听的抒情之音，却足够产生那种“世道要变了”的震惊体验，声音由此成为人们感受到政治氛围变化的先导。

### 三 文学的再媒介化 与“听觉共同体”的生成

在20世纪70年代末，普通民众对广播的接受程度远超同时期发表的文学作品。上文的分析将之归因于广播媒介特有的声音叙事，以及听觉主体的感官经验遭遇的重大变化。简言之，作为大众媒介的广播，不仅使刘心武的小说以声音的形式迅速传播，而且使其成为特定时期内的思想解放和人性启蒙的先声信号。不过，正如上文指出的，广播电台带给人们的听觉经验还是要置于社会文化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事实上，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刘心武小说的启蒙性并不必然地构成对此前革命话语的反思，反而内在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刘心武小说具有的启蒙精神主要是作家本人“在想象中对自身启蒙主体位置的确认”。“刘心武之所以能在想象中完成对启蒙位置的自我确认，并不表明他有多高明，而只是说社会时代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启蒙’的‘空间’，他适逢其时地占据了这一启蒙的‘位置’。”<sup>[33]</sup>这不仅体现在小说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上帝视角”的叙述人指明未来的方向，或是强行接上光明的尾巴，更是因为小说控诉历史创伤的主题本身构成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即便不能将刘心武小说的出现直接视为“拨乱反正”的历史产物，也应该承认，它不仅是对历史的控诉，也借此配合新的时代要求。

这就意味着，由刘心武小说所开启的新时期文学，通过对历史创伤和社会问题的书写，从而获得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干预，以文学为媒介传达对现实的需求。这种以文学为媒介的做法在与广播的结合中更加直接地得到体现。这是因为，广播电台播出的文学作品，首先就要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思想性），其次是要考虑作品本身的风格是否适合播出（艺术性）。而就新时期初期的文学而言，刘心武的小说以符合时代需求的主题和反映现实的品格，恰逢其时地占据了位置，从而在与广播的联姻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文学以特定时期内特有的“媒介性”，与广播自身的媒介性充分结合，进而

重述小说故事。也就是说，文学借助广播实现“再媒介化”，不仅以声音的形式直接作用于听众的身心感受，也通过生成新的听觉经验，建构新时期的意识形态。

从媒介的角度理解新时期文学的听觉经验，意味着它不仅关系到声音本身的内容形态，也和收听行为依托的媒介密不可分。麦克卢汉说：“媒介研究的最新方法也不光是考虑‘内容’，而且还考虑媒介及其赖以运转的文化母体。”<sup>[34]</sup>莱文森认为“媒介即信息”的意义在于，“我们对任何传播媒介的使用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它传播的特定内容”<sup>[35]</sup>。也就是说，相比于媒介所携带的内容，媒介自身的特性同样值得关注。如果说小说的表现题材还是在内容上激活了现代主体的听觉经验（“听什么”），那么听众以何种方式来收听节目（“怎么听”），则涉及媒介背后的文化政治。广播带来的感受被听众以来信的方式热情真诚地记录下来，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人们收听小说时那种激动人心的情景：

在拉萨的一家商店里，收音机放在柜台上，售货员、顾客都被这个小说的广播吸引了，营业也只好暂停。

在陕西的一个家属院里，小小的收音机旁围着一群男女老少，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广播，……呀，原来是关于爱情的，广播里怎么会有这个字样呢？噢，现在解放了！

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里，三个青年几乎在用“全部身心倾听着”电台广播，他们是多么需要这样的指导青年生活的优秀读物啊。他们轮流守在收音机旁，尽可能地收听每天四次的青年节目广播，花了很大气力，录写了一份很不完整的小说手抄本，然后，把它推荐给大队团支部，在青年大会上朗读、讨论。<sup>[36]</sup>

我打开收音机，收听《青年节目》。本来并没有注意去听，但播音员一开始的介绍立即像磁石般把我吸引住了，我身不由己地坐了下来，几乎是屏着呼吸在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像重锤一般深深地扣动了我的心扉，仿佛自己也在扮演着小说中的某个角色……<sup>[37]</sup>

这里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收音机作为收听工具而广泛参与到听众接受的过程中来。在上述收听行为中，听众无一例外地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这表明收音机已经取代此前的高音喇叭成为较为普及的媒介设施<sup>[38]</sup>。民众通过自主购买收音机的方式，主动改善自己的生活，使广播从国家主导的公共文化转变为家庭化和个人化的媒介，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sup>[39]</sup>。再有，彼时听众在收听广播的过程中往往会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甚至会因此而排斥其他行为。这种“沉浸式收听”让广播的节目内容尽可能地被听众接收，甚至还有“是一个人关紧了房门，怀着新奇而又不安的心情收听的，甚至门外走廊上有一点响动便心跳不止，仿佛我不是在收听对我们青年人的专题广播，而是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sup>[40]</sup>。原本诉诸声音形态的广播不仅直接作用于人的听觉感官，也带动整个身体经验的觉醒。但这种身体经验不意味着声音完全被锁定在私人领域，而是在突破了此前的集体主义导向的同时，由于广播以更加日常化和沉浸式的方式被听众接收，反而更有利于听众形成认同感，从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发挥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调动起人的全部感官的广播，不仅在声音层面上激活现代主体的听觉经验，也使得收听行为具有某种共同体的意味。

如果说印刷媒介塑造了个人主义，那么广播则具有“几乎在转瞬之间使个人主义逆转为集体主义”<sup>[41]</sup>的力量。麦克卢汉认为：“广播的潜意识深处，充满了部落号角和古老鼓乐的共鸣回荡……这个媒介有力量把心灵和社会转换成一个共鸣箱。”<sup>[42]</sup>伊尼斯认为，广播“由于不受文化程度的拘束而打破了阶级界限，它有利于集中化和官僚主义”<sup>[43]</sup>。广播在不同身份的听众之间达成了无形的联结，至少在表面上消弭了阶级、种族、性别、城乡之间的区隔。学者希尔穆斯指出，广播在建立现代国家意识的“想象的共同体”中起到关键作用：“广播从技术、文化上，用共同的语言，通过半官方半私人的形式，面向整个国家播音，谈论事关整个国家的事情。这呼应着日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论断。”<sup>[44]</sup>不过，广播建构起的“想象的共同体”，还是与安德森基于印刷资本主义的观点有

所区别。唐小兵进而指出,“‘声音的共同体’具有更大的能量和自我表达能力,它不只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与我们的身体和日常经验发生直接关系的社会集体和身份认同”<sup>[45]</sup>。不难想象,当每天清晨准时从电波里听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节目内容,全国人民在同样的时间共享着相同的国家大事,仿佛置身于重大历史时刻而成为时代的见证者。就新时期初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广播非但没有脱离公共文化,反而因与他人处于公共或半公共的空间而建立起心理上的认同。即便是独自收听广播,也有很多人会提前根据报纸上刊登的节目预告,来选择自己喜爱的节目准时收听,这就使得收听广播成为事先需要准备的活动。其结果是,广播以其节目安排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规划者乃至组织者,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把既定的时间机制内化于生活之中,在时间的意义上创造了共享的历史经验。

并且,这种共享的历史经验“不仅积极发挥着凝聚‘共时性’体验的力量,而且沟通、生成着这一经验的意义”:“广播不仅对其时代的主要社会张力做出回应,而且通过在音乐、喜剧和叙事剧中直接对观众的情况发言,使得这些张力成为其所建构的话语世界的内容。”<sup>[46]</sup>这表明广播不仅是发生在社会转型期的媒介,其自身也是表现和促进这种变革的媒介。在上述收听行为中,广播播出的小说成为听众渴望用来“指导青年生活的优秀读物”。这意味着文学借助广播带给听众重构日常生活的可能。尽管这种通过文学来指导生活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成为听众的普遍想法。而只有在价值观亟待厘清的新时期初期,文学才会在全社会中充当确立正确价值观的媒介,通过建构新时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起到教育民众的政治功能<sup>[47]</sup>。所以当年的刘心武才会要求自己“不是当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而是继续当一个与革命事业血肉相联的战斗一员”<sup>[48]</sup>。在此基础上,刘心武的小说借助广播特有的声音叙事和传播优势,增强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获得更加直接广泛地干预现实的能力,从而在客观上起到配合时代任务的要求。

不过,广播虽然起到配合时代要求而确立新观念的作用,但当人们在小说中听到人物及其发生的

故事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和自身生活联系起来,甚至会加强他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这表明听觉共同体在生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缝隙。还是以《爱情的位置》为例。在题为《什么是革命的爱情?——推荐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的节目预告中,广播电台的编者写道:“在阶级社会里,爱情是有阶级性的。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来说,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爱情呢?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动思潮的影响,这个严肃的问题也受到干扰,因而在广大青年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sup>[49]</sup>刘心武在给青年的信中也说,之所以要写这篇小说,“正是出于愿为革命的爱情大造舆论的那么一种心情”,“尚且可以起到为革命爱情撑腰的作用”,还认为“革命者的爱情,首先要建筑在有共同的革命理想上”<sup>[50]</sup>。不难看出,无论作家本人还是电台编辑,他们都把小说的主题认定为革命者应当拥有什么样的爱情。这从小说的具体内容上也可以得到印证。但有趣的是,听众由于有着更加自主化的解读而有意无意地改变了广播电台起初想要传达的内容和小说的主题,以至于几千封听众来信中,“至少有一百来封是叙述自身爱情悲剧的”<sup>[51]</sup>。从这些听众来信中选编的《让我们来讨论爱情》的书中,收录最多的除了控诉过去年代对爱情的戕害和探讨“什么是爱情”的内容之外,就是像“爱情和金钱的关系”这种明显贴近自身生活的现实问题。再结合1979年前后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也有着大量关于婚姻爱情问题的内容播出<sup>[52]</sup>,更不必说此时来自海峡彼岸的邓丽君的爱情歌曲正以“偷听敌台”的方式悄悄传入人耳<sup>[53]</sup>。普通听众以其自主化的解读方式从广播中获取对现实的重新感知,并以此作为自身生活的启蒙和向导。这种向导并非某种明确的政治观念,但通常会形成比政治观念更为宽泛的日常生活体验。广播虽然本质上基于“自上而下”的单向传输,但听众依然可以在收听过程中生发对现实特别是自身生活的重新理解,融入对现实图景的全新感知,也反过来以此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也使得小说超出了作品本身想要表达的时代主题。

由此说来,以听觉文化探讨刘心武小说,有可能发掘以往被遮蔽的听觉经验在社会层面发挥的重

要作用,甚至成为我们理解当代文学的新角度。从听觉文化的角度理解当代文学,不仅是对被忽略的声音维度的彰显,进而构造出“有声的八十年代”,为文学史增添“音轨”,更是要以此打开文学史的历史多质性,释放出声音和听觉具有的潜能。而就本文关注的问题,从声音到听觉,既是国家建构新时期意识形态的途径,也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文学的方式;既通过媒介技术的手段增强文学对受众的深刻影响,也以此来对传播对象施加改造与收编;既体现出声音政治对听觉主体的有力塑造,也不排除“听觉共同体”内部蕴藏的多重话语。而听觉文化研究就在这种“众声喧哗”的状态中显示自身对问题的张力和辩驳。

[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北京历史文化题材文艺作品创作研究”(项目编号21WXA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1]《取缔反动广播电台 加强人民广播事业》,《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6日,第4版。
- [2]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第15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3][6][15][29]刘心武:《何处有涌泉?》,《心里难过》,第156—157页,第157页,第158页,第157页,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
- [4]刘心武:《乘着电波的翅膀》,《心里难过》,第155页。
- [5]刘心武:《关于〈班主任〉的回忆》,《我是刘心武》,第16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7]周建平:《刘心武印象》,《1994:南方的河》,第76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 [8]《胡耀邦同志谈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见《广播电视工作文件选编(1978—1980)》上册,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编选,第9—1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
- [9]张香山:《坚持自己走路,发挥广播电视的长处,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张香山同志在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见《广播电视工作文件选编(1978—1980)》上册,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编选,第361页。
- [10]参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杨波主编,第379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 [11]王蒙:《我收听了〈梦幻曲〉》,见《王蒙文集》第9卷,郭友亮、孙波主编,第395页,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
- [12]《中国的广播节目》,《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编,第667—668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 [13]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第188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 [14]《人民文学》记者:《报春花开时节——记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作品集》,《人民文学》编辑部编,第6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 [16]黄平:《从“天安门诗歌”到“伤痕文学”:关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再讨论》,《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
- [17][21][22][30]刘心武:《1978年春:为爱情恢复位置》,《心里难过》,第185页,第185页,第184页,第185页。
- [18][26]冯牧:《解放思想 正视现实 打开眼界 开阔视野——在中央戏剧学院编剧进修班的讲话》,《冯牧文集·讲话卷》,第30页,第36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
- [19]《十月》由刘心武所在的北京人民出版社创办,但由于当时没有立即获得刊号,就以文艺丛书形式出版。《十月》创刊号的封底印有“一九七八年八月出版”。
- [20]重播的节目预告中说:“这个作品发表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文艺丛书《十月》第一期上,附告。”参见《关于重播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广播电视节目报》1978年7月29日,第2版。
- [23]何西来:《人的重新发现——论新时期的文学潮流》,《红岩》1980年第3期。
- [24]雷达学(雷达):《给爱情以应有的位置——〈爱情的位置〉的思想意义》,见《刘心武研究专集》,朱家信等编,第41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25]《爱情的位置》引起轰动之后,文学界出现了很多爱情题材的小说,如陈国凯的《代价》、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李国文的《月食》、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有些被拍成电影;还出版了爱情题材的小说选,如《爱情小说集》(本社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爱——爱情小说选》(兆岱丹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爱的天平》(《广东青年》编辑部编,花城出版社1980年版)。
- [27]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第9页,



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8][37] 刘心武:《关于“米黄色”的回忆》,《文汇报》2018年11月17日,第8版。

[31] 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风、翁桂堂译,第1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2] Emily Thompson. *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 Architectural Acoustics and the Culture of Listening in America, 1900-1933*,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2, p.1.

[33] 徐勇:《“启蒙”的“位置”及其变迁——1980年代小说中“班主任”形象的功能分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34][41]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第37页,第37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35] 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第4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节目》编辑组:《讨论是这样引起的》,见《让我们来讨论爱情》,刘心武等编著,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8] 虽然在1978年以前,收音机的数量呈增长趋势,但整体增长较为缓慢,个别年份还有下降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以后,半导体收音机的数量以较快速度增长。1978年,全国共有收音机7546万台,相比1973年的1800万台明显增加,且同期广播喇叭的拥有量开始出现下降的情况。1979年,收音机产量达到1387.5万台,其中半导体收音机占96%。参见《1949—2009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编,第41页,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

[39] 参见徐敏《电视的兴起:1980年之际中国内地电子媒介与日常生活》,《文艺研究》2014年第12期。

[40] 金小丽:《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见《让我们来讨论爱情》,刘心武等编著,第19页。

[42] 《麦克卢汉精粹》,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何道宽译,第43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3] 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第119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44][46] 米歇尔·希尔穆斯:《广播与想象的共同体》,王敦、程禹嘉编译,《文化研究》第32辑,第59页,第5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45] 参见唐小兵在2018年5月18日复旦大学“现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实践”研讨会上的发言《有声电影、民众歌咏与新的大众抒情文化》,转引自李盛《制造新声育新人——经典革命歌曲与“新中国”听觉共同体》,《文化研究》第46辑,第11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47] 周展安认为:“刘心武紧贴着时代主潮的脉搏,记录了历史转折期的社会心理,对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做了堪称忠实的诠释,具有历史文献的意义。”参见周展安《1970年代末期的“精神危机”及其克服——以刘心武七八十年代之际的创作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1期。

[48] 刘心武:《班主任》,“后记”,第25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49] 《什么是革命的爱情?——推荐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广播电视节目报》1978年7月8日,第1版。

[50][51] 参见刘心武《同青年朋友谈谈爱情》,见《让我们来讨论爱情》,刘心武等编著,第62—83页,第78页。

[52] 包括高三亮和梁秀英的讲话稿《冲破旧思想束缚、建立自主的幸福家庭》(1978年12月30日)、“正确处理婚姻恋爱关系的一组曲艺节目”(1979年1月9日),石仲泉读了马克思写给燕妮的信后写的文章《爱情的颂歌》(1979年1月19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德华的春节广播讲话《和青年们谈谈婚姻恋爱问题》(1979年1月27日),尤畏写的广播稿《父母不同意我们的婚事时怎么办?》(1979年3月10日),通讯《爱情不用金钱买》(1979年6月11日)等。

[53] 参见陶东风《回到发生现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以邓丽君流行歌曲为个案的研究》,《学术研究》2018年第5期;陶东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流行歌曲的传播语境与接受效应——以邓丽君为个案的考察》,《现代传播》2019年第3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罗雅琳